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

民国初年的动荡

周俊旗 汪丹 /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古老大地的新时代	(1)
一、了不起的丰碑	(1)
二、新政体的魅力	(5)
三、凯歌声中的危机	(8)
第二章 西方政治制度在中国的畸变	(14)
一、政党政治的误区.....	(14)
1. 围绕政党政治的论争	(14)
2. 组党热潮及其分化组合	(20)
3. 民初政党政治的评估	(29)
二、多灾多难的议会.....	(31)
1. 断断续续的国家议会	(31)
2. 虎头蛇尾的地方议会	(46)
3. 对中国议会政治的评估	(50)
三、无法可司的司法.....	(56)
1. 坎坷曲折的制宪之路	(56)
2. 形同虚设的司法独立	(64)
四、行政系统的苦恼.....	(69)
1. 频繁更迭的内阁	(69)
2. 军阀附庸的各级行政机构	(71)

3. 行政系统的腐败	(75)
五、诸神容易送神难	(77)
1. 对平城的渴望与失望	(77)
2. 送不走的虚神	(82)
3. 禁运军火的效果	(84)
第三章 边疆危机与外交危机	(88)
一、烽火频频边关急	(88)
1. 沙俄制造的外蒙危机	(88)
2. 沙俄在新疆的侵略活动	(94)
3. 英国插手西藏与中英交涉	(97)
二、列强对北洋政府的控制	(103)
1. 列强得以控制北洋政府的原因及方式	(103)
2.“财政援助”的俘虏——皖系控制的中央政权	(108)
三、几件外交交涉事件	(113)
1.“参战”引起的风波	(113)
2. 危险的同盟	(117)
3. 巴黎和会的前前后后	(121)
4. 北洋政府的修约外交	(126)
第四章 新经济的成长	(134)
一、民国的“家底”	(134)
1. 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135)
2. 清末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局限	(137)
二、动荡时期的黄金时代	(139)
1. 民初发展实业的有利环境	(139)

2. 春风得意马蹄疾	(144)
3. 高速度与低水准	(148)
第五章 文化土壤的初步改良.....	(153)
一、两千年厚土的积淀	(153)
1. 民国大厦地基下面	(154)
2. 黄土地深处的沉寂	(160)
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	(162)
1. 近代教育与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产生	(163)
2. 新型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转换	(170)
三、广泛展开的新文化建设	(173)
1. 教育机制的进一步完善	(174)
2. 社会文化机构的普遍建立	(175)
3. 各类民间社团的纷纷涌现	(181)
第六章 对中国前途的探索.....	(185)
一、困境中的失落与彷徨	(185)
1. 革命党人的悲叹	(185)
2. 思想先驱们的苦闷	(187)
3. 传统主义者的忧虑	(192)
4. 平民阶层的躁动	(195)
5. 西方思潮的广泛引入	(197)
二、“北大现象”与新文化运动	(200)
1.“兼容并包”:文化新格局的形成	(201)
2.“人的觉醒”:新文化运动的勃兴	(205)
3. 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再飞跃	(210)
三、新儒家:凝重而幽长的改造梦想.....	(214)

1. 新儒家的出现	(215)
2. 新儒家的初期代表人物	(219)
3. 新儒家与中国现代化	(226)
四、孙中山与三民主义的发展	(231)
1. 民国肇始的蓝图构想	(231)
2. 命运多舛：三民主义的困厄	(235)
3. 与时俱进：三民主义新释	(240)
五、被压迫者的福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植根	(245)
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	(245)
2. “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学说脱颖而出	(249)
3. 思想界的论战：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兴盛	(254)
第七章 变革中的社会习俗与心态	(263)
一、新风尚对旧习俗的冲击	(264)
1. 参政热	(264)
2. 婚姻家庭的变革	(267)
3. 就业选择的多元化趋向	(269)
4. 消费意识的出现和娱乐内容的丰富	(272)
5. 礼俗新貌	(274)
6. 妇女解放新潮	(276)
7. 大波对农村的冲击	(278)
二、新的社会意识的出现	(281)
1. 公民意识	(281)
2. 参与意识	(282)
3. 人权意识	(283)

4. 竞争意识	(285)
5. 求知意识	(287)
6. 买办意识	(288)
第八章 难圆的强国梦.....	(291)
一、两种政治体系的结合体和过渡期	(291)
二、一元的传统与多元的现实	(296)
三、龟与兔的赛跑	(300)
四、欲上高楼且泊舟	(308)
后记.....	(314)

第一章 古老大地的新时代

古老的东方大地曾孕育了辉煌的文明，随着历史车轮的前进，这种辉煌已显得十分遥远。19世纪下半叶，被人称为睡狮的中国被西方的枪炮和文化惊醒了，他想方设法努力恢复自己昔日的威风，经过几代有识之士的努力，巨大的中国船不断追着航线前方的船队。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枪声唤起了中国人又一次的迈进，把中国带进了一个充满希望与坎坷的转型时期。

一、了不起的丰碑

1912年元旦下午17时，孙中山由上海乘车到达南京车站，一时间军乐齐奏，欢呼声震天，长江上的军舰鸣礼炮21响。这一天晚上，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告中华民国正式成立，这是古老的中华大地发生的一件极其重大的事件，它标志着封建帝制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当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之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已进入垂暮期，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与蓬勃发展的西方资本主义差距越拉越大。鸦片战争是西方资本主义第一次较大规模冲击中

国封闭的大门，也是中西两种政治制度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其结果使以天朝上国自居的中国人在心理上受到了强烈的震撼。此后的几次中外战争，均以“天朝上国”的失败而告终，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中华民族，其生存已受到威胁，不少中国人的心理由自尊自大转变为自卑，民族整体的自信心很长时间不能建立起来。但是，在接受中华民族从未有过的挑战之时，中国的有识之士一直在探索重新振兴华夏的道路。从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到洋务派练兵设厂求强求富的努力；从维新思潮、戊戌变法的政治尝试及声势浩大的立宪运动，到 19 世纪 90 年代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始创建共和国的努力，终以革命派发动的武昌起义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辛亥风云终于推翻了封建专制政体，创建了共和国。在 70 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在学习西方的道路上几经曲折，几经努力，终于取得了空前的成果，结束了束缚中国发展的封建专制制度，引进了西方的政体，在中国历史上树立一座了不起的丰碑。

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是孙中山先生提出的改造中国的设想。孙中山立志“亟拯斯民于水火”，是以欧美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为典范的。他指出，“将取欧美之民主以为模范”，“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效法美国”^①。1894 年檀香山成立的兴中会政纲和 1895 年在香港兴中会的会员入会誓词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的主张。1897 年，孙中山先生在伦敦发表《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提出建立民主政体的主张。当时

^① 《孙中山全集》第 1 卷，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560、563 页。

他提出要推翻清政府，建立一“良好政府”，这“良好政府”是指“合众政府”或民主立宪政体而言。同年他告诉宫崎寅藏说“夫共和政治不仅为政体之极则，而适合于支那国民之故，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①。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以“建立民国”为革命三大宗旨之一，孙中山先生在1906年制订的《军政府宣言》中明确提出“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公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②。同时，孙中山先生还设计了具体的民国形式，提出“五权分立”的主张，分行政、议政、审判、考试、监察五权，以弥补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不完备，希望中国的民主制度能学习西方制度之长而弥补西方制度之短。与此同时，革命派的邹容、章炳麟等人也就中国实行共和制度做了论述。不过，由于当时形势的特点，孙中山及革命派以宣传反清和建立民国的武装起义实践为主要任务，对未来政体的设计还只是粗线条的。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一直实行着封建专制制度，皇帝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皇帝视“国”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将“民”作为自己的奴仆。历史上数百次农民大起义要推翻这种吃人的封建社会，但不是被血腥镇压，就是做了改朝换代的工具。辛亥革命造就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大变革。民国的建立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结束了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历史，此后，谁想做皇帝就被视为大逆不道，就会受到

①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173页。

②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舆论和各阶层的反对，民主共和观念开始在广大中国人心中占有地位，民众中的皇权观念已发生根本动摇。尽管民国历史的发展充满坎坷，不尽如人意，但许多人仍认为应坚持在民主共和制度下改革，逐步将民国政治经济纳入正式轨道发展，改革那些被旧势力旧习惯影响的政治行为，从而反对恢复封建专制制度，这也是民初两次封建复辟草草收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华民国的建立推翻了“洋人的朝廷”清政府，使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受到挫折。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威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阻碍中国经济发展，封建政权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基础。民国建立后，新的政治体制支持发展民族经济，加上舆论自由，为民族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反帝爱国运动日益广泛和深入，国家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使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活动受到人民日益自觉和日益壮大的抵抗。同时，中国建立共和制度，对亚洲人民的反帝斗争也是一个有力的鼓舞，“标志着20世纪初所揭开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的阶段”^①。

中华民国的建立功绩还在于开创了新的政治格局。尽管有许多挫折和倒退，但它毕竟是向着光明的前途过渡的历史时期，客观上孕育着促进民族振兴的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从黑暗中国向光明中国迈进的一个不可少的历史阶段。

^①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8页。

二、新政体的魅力

中国实行了共和制，人们的评价和预感不同。拥护共和为共和奋斗的人感到欢欣鼓舞，认为中国腾飞指日可待；反对共和的人觉得大祸临头，中国将走向灾难。还有许多人仍麻木地对待这一切变化，消极等待着命运的安排。中国和世界都在观看共和以后中国如何发展，刚刚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顿时受到世人的普遍关注。南京临时政府是由资产阶级革命派、立宪派和表示拥护共和的旧官僚联合组成的，临时政府在孙中山的领导下，通过“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方法，使基本是留学外国、年轻有为的同盟会会员任各部次长，临时参议院也是革命派占有优势，南京临时政府的实权实际掌握在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手中。

新政体、新政权采取什么政策颇为世人所关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政策，特别在《临时约法》中，以法律的形式宣告了中国与封建专制政体决裂。

在政治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原则，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通令保护华侨；禁止买卖华工，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买卖契约和一切主奴身份；承认“疍户”（水上居民）等所谓“贱民”在政治经济上和其他人民一样享有同等的权利。人民的人身、家产受到保护，人民有言论、著作、集会、结社等自由。为保护人民权利，以示与封建官僚机构的不同，南京临时政府命令官厅焚毁刑具，禁止刑讯，整顿警

察队伍和治安秩序，整顿吏治，宣布对利用职权欺压良民、贪财中饱，违背共和宗旨的官吏要依法严惩，并号召人民揭发检举，人民可直接到中央政府和各省都督府控告。2月3日，临时政府颁布了保护人民财产令，规定原有一切私产仍归个人享有；没收清朝官产归为国有；对清官僚的财产视其对民国的态度决定是归还还是没收。临时政府还宣布一些废除封建等级制度的政策，革除“大人老爷”的称呼；剪除象征清朝顺民的辫子，提倡男女平等，禁止束缚妇女的象征——缠足，严禁蓄娼；临时政府还明令严禁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严禁赌博等^①。

军事方面，针对当时各地军队分散和纪律涣散状况，南京临时政府决定整编陆军、海军、整顿南京卫戍区。南京卫戍区和陆军部发布通告和军律，规定凡有抢、窃、焚杀良民、强奸妇女者一律枪决，纵酒行凶等要受处罚等12条军纪。通令各地军队不许私自筹饷，以杜绝一些军队以筹饷为名招摇撞骗掠取钱财之恶行。针对一些军队只求数量，不求精练的状况，命令各部队停止招兵，注重军事训练，准备全力北伐。

在经济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了一些奖励工商业发展的工商制度，鼓励人民兴办实业，从事农垦，欢迎华侨在国内投资。2月5日，临时政府实业部通知各省迅速成立实业司，立即开办实业，并指出：“实业为国民将来生存命脉。”实业部还通知各地保护商业，加强贸易。在临时政府经济政策的号召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第8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0~31页。

下，许多人对兴办实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实业协会、工业建设会、各种垦植会等团体纷纷成立。实业界人士兴奋地表示：“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也。”工业建设会表示要“以群策群力，建设工业社会，企图工业发达为宗旨。”要集各种专家和技术人员，推动工业发展。各地出现了一个开矿办厂、修铁路，争办实业的高潮。

在文化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也提出不少进步措施，如提倡男女同校，奖励女校，废止读经等。1月19日教育部颁发《普通教育暂行办法》14条，规定将以前的各种学堂均改为学校，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合于共和宗旨”，学校教员看到教科书中不合共和精神者，可自行修改，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①。有的省教育厅还发布通告，如再有让学生读“四书”“五经”者，一经查出，严加惩戒。与此同时，教育部还批准新办了一些工业科技学校、女子师范学校、蒙回藏师范学校，推动新式教育的全面发展。

南京临时政府在短短三个月的时间里，颁布了大量的革命政策，反映了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向上的革命精神，体现了他们为造就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而奋斗的朝气蓬勃精神。尽管资产阶级革命派在理论上、实践上还有许多的不足，也由于其自身势力的不成熟、不强大和盘根错节的旧势力的顽强抵抗，临时政府的这些政策最终是纸上谈兵，实效不大。但是，这一新生政权以全新的面貌的亮相，是辛亥革命否定了旧的政治体制之后，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诸

① 《东方杂志》1911年8卷，第10号。

领域向传统挑战的有力一举，同时也激励了要使中国走上强国路的一批人努力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它也促使了中国社会向新时代的转换过程，其深远意义不可低估。

新式政权将她的全新面貌，展示在古老而千疮百孔的神州大地上，充满了魅力。

三、凯歌声中的危机

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许多骨干是在国外接受过资产阶级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与国内有着各种联系，但毕竟对国内的情况不十分了解和熟悉。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他们中的不少人认为推翻封建专制大功告成，急于想建设新的中国。一些人急忙“功成身退”，对于民国建成后仍要走复杂曲折的路思想准备不足，尤其是低估了旧势力的顽固性和复杂性。

中国封建社会官场的风云变幻，造成了一批老谋深算、工于心计、善于在变化的政治风波中自我保护和钻营发展的人。在清政权统治摇摇欲坠的最后几年，他们在观察政治风云，寻求新的生路。当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武装起义屡仆屡起，最终使武昌起义成功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变化，清政权的统治已无法维持下去时，曾表示要对清廷忠心耿耿，“决不辜负孤儿寡母”（指宣统皇帝和隆裕太后）的袁世凯在掌握军政大权后，对革命党人又拉又打。他指使北洋军攻陷汉阳即按兵不动，迫使革命阵营正视他的军事实力；同时使列强认为只有袁世凯才是收拾局面、继续维护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代理人。在列强的干涉下，南北进行了议和谈判。在列强、袁世凯及革命

阵营内部立宪派、旧官僚等人的压力下，终于使孙中山等人做出承诺，如果袁世凯赞成共和，使清帝退位，“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

袁世凯得到了这一保证，于1月16日朝见听政的隆裕太后，他跪在太后面前，满面泪痕、哽咽咽地说：“海军尽叛、天险已无”，北洋六镇已无法防卫京津，“虽效周室之播迁，已无相容之地”。一句话，除非皇帝自行退位实行共和以换取优待条件外，别无出路。1月26日，袁世凯的亲信、部下段祺瑞等46名北洋将领突然从前线发来要求清帝退位的电报，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①。2月5日，段祺瑞等人又发了一封致内阁请代奏电，指出“共和政体，原以致君于尧舜，拯民于水火。乃因二三王公迭次阻挠，以至恩旨不颁，”因而，他要“谨率全军将士入京，与王公剖陈利害”^②。在革命派的军事力量和袁世凯内部逼宫的压力下，走投无路的宣统皇帝只得于2月12日发布谕旨宣布退位。

迫使清帝退位的直接动因是袁世凯的逼宫。但袁并非转向革命而倾心共和，而是因中华民国有一大总统的位置给他。在晚清政府的封疆大吏中，袁世凯并不是头脑顽固、僵化的人，他在任军政要职过程中，如主持小站练兵和在天津主持军政时期，都从西方学习了一些有益的经验，使军队的近代化和城市的近代化迈出有益的一步。不过，他仍属于封建官僚，仅对自己仕途感兴趣，这从他在1898年出卖维新派的举动中可

① 《辛亥革命》第8册，第174页。

② 《辛亥革命》第8册，第178~179页。

以清楚地了解到。1912年，归国任职的顾维钧与袁世凯进行了一次谈话，袁问顾中国如何才能成为共和国，以及共和国对中国意味着什么。顾维钧在这次谈话中得到的印象是“袁世凯不懂得共和国是个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共和国为什么一定比其他形式的政体优越。……他不只是不了解共和国需要什么或民主如何起作用，看来他根本没有实现共和或民主的愿望”^①。

中国实现了共和制，远不意味着与传统一刀两段，对共和并不了解的袁世凯却积累了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这些经验使他在对革命党人的斗争中游刃有余，几乎步步得胜，如愿以偿。他在清末民初政治格局中的崛起，使新生的民国蒙上了一层阴影。

逼宫得手后，2月13日袁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所造成，亦民间无穷之光荣与幸福”。并呼吁“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见于中国”。缺乏对中国官场了解和政治斗争实践的孙中山被这些冠冕堂皇的话蒙骗，2月14日向临时参议院辞去临时大总统职，指出，“现在清帝退位，专制已除，南北一心，更无变乱”，以为“从此帝制永不留中国，民国目的，业已达到”，他还指出，“此次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举为总统，必能尽忠民国”^②。当天临时参议院接受孙中山辞职，2月15日召开临时总统选举会，袁世凯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

①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2~93页。

② 蔡寄鸥：《鄂州血史》，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84、185页。

统，袁世凯实现了其政治目的的第一步。

孙中山辞职时，曾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必须遵守参议院所制定的《临时约法》等条件，作为保证民主制度和防止袁世凯独裁专权的措施。袁世凯并不在乎这几个条件，满口答应，略施小计便使这些措施失效。迎袁专使蔡元培去京迎接袁世凯南下，袁表面要南下，背地指使心腹在北京、天津等地制造兵变事件，造成北方政局混乱、袁不能离开北京的假象。迎袁专使信以为真，南京只好让步，最终决定建都北京，这样袁仍留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革命派势力不能牵制他。3月10日，袁在北京就职，不久便组成唐绍仪内阁，政权实权掌握在袁的党羽手中，革命党人仅是陪衬而已。

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初，自己统治基础还未完全稳定，革命派的声势仍较大，并控制着南方数省和参议院的多数，国内民主潮流亦在高潮，正如梁启超所分析的：袁世凯“兵虽厚，然欲借此以平十四省，则不仅势所不可力所不能，且亦心所不敢”。^① 所以此时他以稳定自己统治为主，仍高唱维护共和、遵守《约法》的高调，在就任临时大总统誓词中信誓旦旦地表示：“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主强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②。南北势力在表面上和平共处，而袁世凯暗地准备大权独揽；革命派渐渐松懈了警惕，以为民国已经走上正轨，中国在共和成功的凯歌声中，实际已经危机四伏。

① 《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568页。

② 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第29页。